

晚清中国官僚层内掀起了一股维新热潮,给沉闷的社会增添了一丝活力,也波及社会的小细胞家庭。

清政府在洋务运动前派出的大使和留学生,满脑子都是封建礼教和华夏有别的古训,一下子置身于风俗习惯迥异于华夏的资本主义世界,看到妇女竟然公开参加社交活动,甚至在公众场合接吻,惊得目瞪口呆,他们把这一切当作笑料介绍给国内人。然而,他们也羞羞答答地夷化了。让随同出国的子女穿洋服,上洋学,也让夫人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后来,有些人为了便于在国外和外国人交往,出国时特地带上可以应付交际场面的夫人。例如出使俄、德、奥、荷四国的大臣洪钧这位同治年间的状元,就以重金把沪上名妓赛金花收纳为妾。到了国外,赛金花便以大臣夫人身份参加社交,出了不少风头。有了这种际遇,回到国内的赛金花就感到无法在洪府呆下去了,于是重操旧业。德龄和容龄姐妹,随父亲裕庚出国,学习外语、西洋音乐和舞蹈知识,回国后,极端顽固的慈禧太后出于和外国人打交道的需要,破格把这俩姐妹选为贴身侍从。这是有趣的变化,但还未真正涉及婚姻家庭。

正式提出改革家庭婚姻的主张并有某些行动的,是继洋务派而起的维新派。表现在:

首先是不缠足。1882年,康有为和他的弟弟康广仁发起,在广东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反对女子缠足的“不缠足会”。不久,上海也出现了“不缠足会”。1903年上海的“中国天足会”还专门出版过宣传不缠足的《不缠足报》。女子缠足起源于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李后主使“三寸金莲”成了女性美的重要标志。这一陋习,历宋元明清,相沿不改。太平天国曾在“发明”缠足的地方下令放脚。太平天国失败后,脚反而缠得更紧了。以至到晚清时期贵为总理大臣的李鸿章,因嫌其母脚大,千方百计限制他母亲抛头露面。康有为曾亲见姑母因缠足无法随丈夫逃难而反对缠足,梁启超1897年在《变法通议》一文中,尖锐批评缠足是“毁人肢体,溃人血肉,一以人为废疾,一以人为刑戮,以快其一己之耳目之玩好。”紧接着他又起草了《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其中规定:入会者的女儿都不缠足;所生男子,不得娶缠足之女;已缠足者,在八岁以下,一律放足。严复更是大声疾呼:女子敷粉缠足是“坐食待毙”;禁缠足,是妇女自立、自强的前提,而妇女的自立自强,又“为国政至深之根本”。

其次是兴女学。中国的第一所女学,是外国传教士1844年在宁波创设的女子学塾。1851年外国传教士又在上海创办了裨文女校。中国人首先倡办女学的是郑观应。1897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进一步论述了兴办女学的重要性。他认为“天下积习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天下大本有二:正人心,广人才。二者都要从‘蒙养’开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梁启超认为,女子学得谋生能力,才能取得经济上的独立。梁启超所谈的女学,充其量也不过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杂拌。清政府在1905年把女学归入家庭教育章程,1907年又拟定了女子师范学堂和女子小学教育章程,把《列女传》、《女诫》当作基本教材。在女子教育问题上,严复的见解要比梁启超高明。1898年,他在《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一文中强调,“人之学问,非仅读

书,尤宜阅世”。阅世,就是读今人之书,知当世之事,而不能把“压制妇女,待之以奴隶”的《列女传》、《女诫》之类的孔孟之书当作课本。

第三,主张婚姻自由,实行一夫一妻制。严复曾在英国留学,资产阶级的婚姻制度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认为“男女自行择偶”和“妇女之出门晋接”即参加社交活动,“实为天理之所宜,而又为将来必行之俗”。婚姻是一个人的终身大事,必须由自己作主,决不能象“探筹抓阄”似的,一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康、梁也都主张婚姻自由,但康有为认为,自由择偶,只限于20岁以上的男女,20岁以下的,“仍由父母约束”。他还主张婚姻要有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最短不少于一月,婚前都要在“媒氏之官”面前订立契约,欢好者允许到期续订契约。他认为,有了契约,又限定了期限,“则奸乱永绝”。康、梁也都主张不纳妾。梁启超在变法失败后出游美洲时,被一位华侨姑娘爱上了,梁也很喜欢她,但梁最终还是以理智战胜了爱情。他对姑娘说:“我和谭浏阳(谭嗣同,湖南浏阳人)首倡不纳妾。我已有妻子,不能违背自己的主张和你结婚。”康、梁和严复等人还主张,妇女应在经济上独立,寻求谋生之道;如果一切全部依赖丈夫,妇女就不能有独立的人格。他们也提倡妇女社交公开,开展性教育。谭嗣同在《仁学》中说:淫起源于对“淫器”的神秘感。如果“淫器”是生在额头上,为人们所习见,没有神秘感,就不至于淫乱了。

维新派的最新主张体现在“去家界”上。这是康有为在《大同书》中首次提出的。他认为:“立家之益即因为立家而有害。”这“害”就是:“有家则有私,以害性、害种”。他认为自从有了家庭以后,人们一切要从家出发,一切都“私于家”,因此,应该“去家”,“去家界”。他提出“无家——有家——无家”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没有家了,孩子怎么办?老人怎么办?康有为的设想是,妇女一怀孕就入“人本院”,由专人照顾,进行胎教。婴儿出生以后,产母出院,婴儿入“育婴院”。此后,依次入怀幼院、蒙学院,一直到进公立大学,全都由公家负责,不须父母过问。人到60岁,则进“养老院”,终其天年,死时送“化人院”(火葬场)火葬。康有为的这些设想是大胆的,但从根本上说,不过是基督教、佛教和儒家“大同”说的混合物而已。辛亥革命前夕,政客江亢虎为了抵制孙中山三民主义在海外华侨和留学生中的巨大影响,曾鼓吹“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的“三无主义”,并在比利时写成《无家庭主义意见书》。可是不久他父亲病死,这个“无家庭”的鼓吹者便慌忙回国奔丧,一时成为笑柄。抗战胜利后,江亢虎在南京出家做和尚,则是为了逃避人民对他这个汪伪汉奸的惩罚。

维新派改革婚姻、家庭,是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婚姻、家庭作典范的。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严复的见识略高一筹。就在许多人交口称赞欧洲妇女的平等权利时,严复却讲:“欧洲妇女唯无妾一事,实胜泰东,其余则仍与男子不平等也。上不为伯里蛮天德(英语“总统”的音译),中不为议员,下不为军士,不过起居饮食、威仪进止之间,男子均优待之耳。”至于受人蹂躏的娼妓,也并非东方所独有,法国各城市都有。他看到了问题,却又找不到解决办法,便悲叹问题由来已久,不能立即改,只好慢慢来。这反映了他的改良主义思想的局限性和软弱性。

○唐 群○○○

维新冲击波中的女性观